

政府质量评价与社会信任： 基于一项全国样本的实证研究

苗红娜

内容提要 社会信任是社会资本的重要内容,它不仅是文化沉淀的结果,更受制于当下的政府行为和质量。根据 2011 年进行的一项全国调查数据分析,政府质量评价对社会信任水平具有显著的影响;民主制度评价、行政效能评价、法治水平评价以及腐败控制评价等政府质量评价的分指标都显著影响着社会信任水平;腐败控制评价对社会信任水平的影响具有稳健性。上述发现表明,提高政府质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人际信任并进而提升整个社会的信任水平。

关键词 政府质量评价 社会信任 实证研究

DOI:10.13858/j.cnki.cn32-1312/c.2014.05.017

苗红娜,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讲师 210023

2013 年中国社科院发布《2012-2013 社会心态蓝皮书》,对北京、上海、广州、郑州、武汉、重庆、西安等七市市民的社会信任调查显示,中国社会总体信任水平进一步下降,表现为人际间的不信任和群体间的不信任进一步加深^[1]。经济快速发展与社会信任度的明显滑落显示了重构社会信任的紧迫性。中共十八大强调“注重上行下效的示范教育,各级领导干部始终坚持身正为范、言传身教,以上带下”,民间谚语也有“村看村,户看户,群众看干部”一说,都体现了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在社会道德方面的示范作用。然而,对于政府质量与社会信任的内在关系国内学术界缺少深入的实证研究。基于上述考虑,本文利用 2011 年一项全国范围的大样本数据,从民主制度、行政效能、法治水平以及腐败控制 4 个维度,实证考察政府质量评价对社会信任的影响。

一、文献回顾:关于社会信任与政府质量的研究

社会信任作为社会资本理论的核心概念,其研究始于 20 世纪 20 年代,最早是社区精神及其建构的文化路径。在社会信任的研究中,政府与社会信任的关系受到广泛关注。帕特南对意大利南北部民主制度绩效的研究首先从学术的角度提出了社会信任与政府绩效的共生关系,认为与南部相比,意大

本文系江苏省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发达地区政府的社会冲突治理研究”(项目编号:13ZZB002)、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项目“公共事务与地方治理研究”(0117133046)“中国政治文化与政治行为研究”项目和南京大学“985”三期改革型项目“中国政治选举研究”(NJU985JD09)的阶段性成果。

[1]中国社会科学院:《2012-2013 社会心态蓝皮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

利北部高度的信任文化产生了较高水平的政治信任和良好的民主治理绩效，但社会信任从何而来？帕特南将其归于历史制度文化传统以及政府的良治^[1]。然而，政府质量与社会信任的因果机制有待论证。

政府质量是评价政府工作的重要方面，但政府质量的多维性增加了概念操作化的难度。世界银行研究中心的考夫曼(Daniel Kaufmann)将政府质量定义为“国家行使权威的传统制度，包括政府选择、监管和更替的过程；有效制定和执行政策的能力以及公民对国家控制经济社会事务制度的尊重。”^[2]罗斯坦在此基础上提出，政府质量应当是一个程序而非实质概念，包括公平行使公共权力，即公平对待享有平等权利的公民；在此公正原则包括了法治以及行政效率^[3]；并指出政府质量限于公共政策执行时的公正性，与民主质量没有必然的联系^[4]。范博宏(Joseph P.H. Fan)等人将政府质量界定为“政府(官员)使其服务对象受益的程度，以及政府是否以合法并被社会接受的方式制定及执行决策”^[5]。有人阐述，关于政府质量的涵盖性定义，认为政府质量研究始于1980年代西方行政改革中的政府全面质量管理，涉及政府的价值取向，如差异化的合法性标准、民主化程度和公平体系，也关乎政府的公共管理模式，包括公共服务产品的供给、政府人力资源管理体系以及政府管理创新等，政府质量是政府的效率、效益和效果的综合表现^[6]。

那么，政府质量是否是影响社会信任的重要原因？罗斯坦(Rothstein)和埃克(Eek)指出，好的政府有利于增进居民间的信任，而腐败和掠夺型的政府将破坏和阻碍社会信任等社会资本的生成^[7]。特奥雷尔(J. Teorell)利用政府公正性指数、行政效率、腐败控制、法治水平作为衡量政府质量的指标体系对52个国家进行实证研究，显示随着政府质量的提高，居民对警察、公务员以及其他人的信任都会提升^[8]。经济学家菲利普·阿格因(Philippe Aghion)等人通过对不信任与政府管制关系的研究，指出人际不信任增强了政府控制经济的需求，同时，政府管制又产生了不信任。这是由于政府管制水平影响到家庭对社会资本的投资，即政府管制影响了家庭对宽容、尊重等理念的教育，而这些正是形成信任等社会资本的根源^[9]。

在对何种社会条件和社会政治制度可以增强社会信任的研究中，韩国学者 Jong-Sung You 对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进行了分析，认为政治清廉、收入公平和成熟的民主与信任正相关，腐败和不公平对规范的可信度具有负面影响，进而削弱了社会信任，其中影响社会信任的重要制度特征是公正性

[1][美]罗伯特·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现代意大利的公民传统》[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2]Kaufmann, D., K. Aart and Z. Pablo, 1999, "Governance Matters",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2196.

[3]博·罗斯坦：《政府质量：执政能力与腐败、社会信任和不平等》，蒋小虎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2年，第8-38页。

[4]Bo Rothstein, Understanding the Quality of Government in China: The Cadre Administration Hypothesis, QoG Working Paper Series, 2012:17, December 2012.

[5]Fan J. P. H., J. Wei, K.C. J., Xu, X. Corporate Finance and Governance in Emerging Markets: A Selective Review and an Agenda for Future Research. 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 April 2011, Volume 17, Issue 2, pp207-214.

[6] 闵学勤：《政府质量评估的微观模型建构——基于全球58个国家数据的实证分析》[北京]《社会科学研究》2013年第2期。

[7]B. Rothstein & D. Eek, 2009, "Political Corruption and Social Trust: An Experimental Approach", Rationality and Society, Vol.21, pp.81-112.

[8]J. Teorell, The Impact of Quality of Government as Impartiality: Theory and Evidence, The Quality of Government Institute, University of Gothenburg, QoG Working Paper Series, 2009.

[9]Philippe Aghion, Yann Algan, Pierre Cahuc and Andrei Shleifer, "Regulation and Distrust", Nov27, 2008. <http://dev3.cepr.org/meets/wkcn/2/2393/papers/Algan.pdf>.

(Fairness) ,包括公正的程序规则(民主)、公正的行政规则(腐败控制)以及公正的收入分配^[1]。尤斯拉纳(Eric M. Uslaner)也将信任与公正性相连,认为不平等削弱了信任,而不信任又增加了腐败^[2]。米切尔·色利逊(Mitchell A. Seligson)通过对四个拉美国家个人层面的调查分析,提出腐败不仅侵蚀了人们对政治系统的信任,而且削弱了社会信任^[3]。利瓦伊(Margaret Levi)认为国家促进人际信任的能力包括监控法律、制裁违法者以及提供有关信任对象的信息和担保信任风险的能力^[4]。世界银行史蒂芬·奈克(Stephen Knack)和菲利普·基弗(Philip Keefer)对 29 个国家的社会资本进行的实证研究提出,政府行政权力的限制和司法独立程度与国民的信任高度正相关,对政府的权力限制上升 1 个点,信任度将上升 1.5 个百分点;司法独立程度上升 1 个点,信任度将上升 8 个百分点^[5]。如果司法严重受行政权力的干预,会导致司法不公和司法低效率,从而影响人们的契约行为,导致合同的违约率上升^[6],并进而影响到社会信任。可见,制度的公正性和腐败控制与社会信任的相关性已得到了学界的承认,但这种关系是否稳固、政府质量的其他维度对于社会信任的关系也没有得到验证。

在与政府质量研究密切相关的政治文化研究中,政治信任与社会信任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得到学界的强调^[7]。但对于这两者关系是因果性的或只是相关性的以及因果关系的方向存在不同的认识。帕特南认为来自志愿社区的社会信任可以强化政治信任,但其他学者的经验研究则表明,如果二者存在着因果机制,则更有可能是政治信任影响社会信任^[8]。

具体到中国来说,如何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提升社会信任水平是当前学界和政界共同关注的问题。已有的研究强调年龄、收入、职业、生活满意度等人口学因素对社会信任的影响,政府质量也受到零星的关注。张维迎对中国的跨省调查显示,良好的信任并非仅仅只是一种文化遗产,它和社会制度以及技术发展水平相关。在所有的制度中,稳定而明晰的产权是促使信任形成的基础,对政府行为的规范和限制是改观低信任现象的重要措施^[9]。张嘉哲(Eric C.C. Chang)和朱云汉的研究表明,腐败会降低居民对政府的信任水平^[10],并影响社会信任。南京大学朱虹等人的实证研究强调,政府信任是重

[1]Jong-Sung You, Corruption and Inequality as Correlates of Social Trust: Fairness Matters More Than Similarity, The Hauser Center for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and The John F.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 in Harvard University, Working Paper No.29, November 2005.

[2]Uslaner, Eric M. 2004. "Trust and Corruption." In Corruption and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Eds. Johann Graf Lambsdorff, Markus Taube, and Matthias Schramm. London: Routledge.

[3]Seligson, Mitchell A. 2002. "The Impact of Corruption on Regime Legitimacy: A Comparative Study of Four Latin American Countrie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64 (2): 408-433.

[4]Levi, Margaret. 1998. "A State of Trust." in Valerie Braithwaite and Margaret Levi eds., Trust and Governance.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5]Knack, Stephen and Philip Keefer. 1997. Does Social Capital Have an Economic Payoff? A Cross-country Investigation.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2(4): 1251-1288.

[6]张维迎、柯荣柱:《信任及其解释——来自中国的跨省调查分析》〔北京〕《经济研究》2002 年第 10 期。

[7]Rotter, J. B. 1971. Generalized expectancies for interpersonal trust. American Psychologist, 26, 443-452.

Luhmann, N. 1979. Trust and Power. New York: John Wiley & Sons.

Gambetta, D. (Ed.). 1988. Trust: Making and Breaking Cooperative Relations. Oxford: Blackwell.

Pharr, S. J., & Putnam, R. D. (Eds.). 2000. Disaffected democracies? What's troubling the trilateral countri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8]Bo Rothstein & Daniel Eek. 2004. The causal mechanism between Trust in Authorities and Trust in Others: An Experimental Approach. . Unpublished manuscript.

[9]张维迎、柯荣柱:《信任及其解释——来自中国的跨省调查分析》〔北京〕《经济研究》2002 年第 10 期。

[10]Chang E.C. C. and Y. Chu, 2006, "Corruption and Trust: Exceptionalism in Asian Democracies?", Journal of Politics, Vol.68, pp.259-271.

建社会信任的关键^[1]。

既有的研究已提出政府质量与社会信任之间存在着紧密的相关的,但这种关系的内在因果机制有待进一步考究。基于上述考虑,本文试图利用一项覆盖中国的微观调查数据,系统分析政府质量评价对社会信任的影响机制。

二、研究设计:数据来源与变量测量

(一)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的居民微观调查数据来自2011年《中国大陆社会价值基本调查》的一手数据^[2],调查采用入户结构问卷调查方法,根据随机抽样方法,在全国2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抽取家庭户,然后在每个被选中的家庭户中按照Kish表的规则随机选取1位18岁以上的居民作为被访问者。

(二)变量测量

1. 社会信任

本文用“您认为,大部分人是是可以信任的,还是与人交往小心为妙”这一问题作为衡量社会信任的指标,这一问项是世界价值观调查以及亚洲价值观调查等大型调查测量人际信任时所使用的题目。由于中国人际信任存在着差序格局,用某一问项来衡量总体的社会信任度似乎有失偏颇。因此,本部分也根据差序信任理论,将对亲戚之外的人(包括单位同事/同宗同族的人、邻居/同村人以及其他有来往的人)的信任均值作为社会信任水平的衡量。三种测量方法的结果如表1。

调查显示,对于不同的问题,结果存在很大的差异。对于“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还是与人交往小心为妙”,50.8%的人选择“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但对“一般来说,大部分人都是可以信任的”这一问题的回答,8成以上的人选择“同意”,比前个问题多出三成。按百分制重新计算对亲戚之外的其他人的信任水平,得分为71.2,也与其他两个问项的值存在较大的差异。由于“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还是与人交往小心为妙”的测量结果与其他学者对中国社会信任水平的测量较为接近^[3],且为了更好地与国际研究相比较,本研究暂利用这一问项作为社会信任的衡量指标,但关于何问题更能准确测量中国社会的信任水平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表1 不同测量问项的结果

问项(单位:%)	不同意/与人来往小心为妙	同意/多数人是可信的	有效合计	看情况	不知道	不回答	缺失合计	总计
一般来说大部分人都可以信任	16.0	82.6	98.6	.3	.7	.3	1.4	100.0
大多数人可信,与人交往小心为妙	44.1	50.8	94.8	3.8	1.0	.3	5.2	100.0
对除亲戚之外的其他人的信任	样本数	均值(均值的标准误)	标准差	方差	最小值	25%分位数	75%分位数	最大值
	3473	4.33(.01)	.75	.56	1.00	4.00	5.00	6.00

的”这一问题的回答,8成以上的人选择“同意”,比前个问题多出三成。按百分制重新计算对亲戚之外的其他人的信任水平,得分为71.2,也与其他两个问项的值存在较大的差异。由于“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还是与人交往小心为妙”的测量结果与其他学者对中国社会信任水平的测量较为接近^[3],且为了更好地与国际研究相比较,本研究暂利用这一问项作为社会信任的衡量指标,但关于何问题更能准确测量中国社会的信任水平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2. 政府质量

对于政府质量的不同理解引发了关于政府质量评估体系的争论。罗斯坦(Rothstein)和特奥雷尔(Teorell)在总结其他学者的论述后,提出了三个可以衡量政府质量的指标,即经济发展、民众对政府的支持度和人民的幸福感^[4]。而巴克(Back)和汉德尼尔斯(Handenius)认为,好的政府质量可以界定为高效

[1]朱虹《转型时期社会信任的状况与特征——一项实证研究》〔贵阳〕《贵州社会科学》2011年第10期。

[2]本项调查是在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肖唐镠教授的主持下完成,笔者作为南京大学公共事务与地方治理研究中心“中国政治文化与政治行为研究”课题组成员,被授权使用这项调查数据,特此致谢。

[3]《社会心态蓝皮书》指出,中国当前的社会信任水平不足60分。中国社会科学院《2012-2013社会心态蓝皮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4]Bo Rothstein and Jan Teorell. What is Quality of Government? — A Theory of Impartial Government Institutions, Governance: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cy, Administration, and Institution, Vol.21, No.2, 2008, p.167.

的行政并且没有腐败^[1]。世界银行发布的世界治理指数往往被学者用于政府质量的评估,包括民意表达和责任性、政治稳定、行政效率、监管质量、法治以及腐败控制六类指标。哥德堡大学政府质量研究中心发布的政府公正性指数^[2]、透明国际的腐败感知指数以及自由之家关于公民自由和政治权利的指数,也被欧洲政府质量研究中心的撒曼尼(Samanni)和霍姆伯格(Holmberg)用来衡量政府质量。

这些机构和学者利用专家评估、公众调查以及经济发展等客观统计指标构建了主客观相结合的指标体系。本文借鉴和综合了这些分类指标体系,利用民众对政府质量的感知水平来测度政府质量水平。具体来说,本文选择的政府质量评价指标有:1)民主制度评价,包括对民主制度的评价和信任;2)政府行政评价,包括政府公共服务绩效、行政公平、行政公开和政府信任;3)法治水平评价,包括司法机关能力、立法机关能力、对警察和法院的信任以及治安状况评价;和4)腐败控制,包括官员守法情况、官员贪腐情况、政府动机以及对官员的信任。采用主成分分析法为每个指标赋予相应的系数,并根据因子负载系数加权生成一级指标,如表2。

表2 政府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及因子负载

一级指标及定义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因子负载
民主制度评价:测量民众的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的实现情况;民众对民主的满意度、自由而公正的选举、对全国人大的信任	民主制度评价	言论自由	.858
		结社自由	.889
	民主制度信任	对全国人大的信任	.717
		对民主实施的满意度	.755
		社区/村选举的公开公平	.598
		对全国人大的信任	.598
政府行政评价:对政府绩效评价的评价、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对政府政策的回应性和公平性评价	政府公共服务绩效	办理身份证、出生证、护照	.715
		孩子注册上学	.712
		在医院拿药	.741
		在需要时获得警察的帮助	.693
	行政公平	人人皆可受到政府的公平对待	.771
		人们都有东西吃、有衣服穿、有地方住以及其他基本的生活必需品	.858
	行政公开	政府官员是否经常对老百姓隐藏重要信息	.592
	对政府的信任	中央政府	.766
		市政府(城市)/县政府(农村)	.793
	法治水平评价:公众对社会法规的信心及遵守情况的感知,对警察和法院的信任,以及暴力和犯罪的可能性的感知。	司法机关能力	当政府违法时,司法机关也无能为力
在我们国家犯罪的官员会不会逍遥法外			.503
立法机关能力		全国人大是否有监督政府领导人的能力	.563
对警察的信任		对公安部门的信任	.746
对法院的信任		对法院的信任	.662
治安状况		您觉得现在居住的这个地方治安状况如何	.650
腐败控制	官员守法状况	政府官员一般是否都会遵纪守法	.621
	官员贪腐状况	当地政府官员	.789
		中央政府官员	.690
	政府的动机	中央政府其实只在乎一些特殊阶层的利益	.868
		当地政府其实只在乎一些特殊阶层的利益	.803
	对官员的信任	对一般政府官员的信任	.659

3. 控制变量

(1)儒家文化变量。信任在文化人类学中是一种历史遗产,因此,儒家文化对社会信任的影响在世界价值观调查中被提出。本文从权威主义、和为贵、集体主义和家庭本位四个维度考察儒家文化

[1]Nicholas Charron and Victor Lapuente, Does Democracy Produce Quality of Government?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Vol.49, Issue4, 2010, pp.443-444.

Hanna Back and Axel Handenius, Democracy and State Capacity: Exploring a J-Shaped Relationship, Governance: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cy, Administration, and Institution, Vol.21, No.2, 2008, pp.1-24.

[2]博·罗斯坦认为执行政策中的不偏不倚,即公正性,是政府官员贯彻法律和政策时,除非该政策或法律已经明文规定,否则特殊公民或特例均不得予以考虑,其次,也要遵循“合理性”。

变量^[1]。

(2)社交网络和社团参与。以普特南为代表的社会学者认为,“人们之间普遍的信任来自志愿性社团内部个体之间的互动,是这些社团推动了人们之间的合作并促使信任的形成。”^[2]经济学的研究指出,重复博弈对于信任的产生具有重要的影响,因此发达的社团组织和中介组织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的成本,使一次性博弈变成重复博弈,从而有助于信任的建立^[3]。因此,本文将社团成员、社交网络和社会支持资源纳入控制变量之中。

(3)人口学变量。学界既有的研究提出了社会信任与个体的个人和家庭特征以及宏观环境变量的关系,如个人的年龄、婚姻状况、收入、宗教信仰、职业状况、生活满意度等影响着其对其他人的信任^[4]。因此,我们构造了相应的人口学控制变量。

4. 数据描述

表3 政府质量指数及各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变量名称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民主感知	3473	12.33	1.65	户口(农业=0;非农业=1)	3466	.31	.46
政府行政评价	3473	22.11	2.68	性别(女=0,男=1)	3471	.53	.50
法治水平	3473	13.69	1.97	年龄(岁)	3472	45.29	15.64
腐败控制	3473	12.71	1.91	教育程度(最低=0;最高=8)	3455	2.86	2.15
儒家传统价值	3473	11.21	1.35	民族(汉族=1,其他=0)	3419	.89	.32
社会信任	3294	.54	.499	幸福感(不快乐=1;很快乐=3)	3430	2.14	.57
社会舆论压力	3474	1.69	.48	下岗家庭(无=0;有=1)	2172	.14	.35
社会支持资源	3473	2.23	.88	婚姻状况(未婚=0;已婚=1)	3458	.82	.39
社团成员	3398	.10	.30	政治面貌(党员=0;其他=1)	3449	.15	.36
社交网络	3385	3.14	1.30	宗教信仰(无=0;有=1)	3428	.13	.34
社会地位 (低=1;高=10)	3251	5.37	1.90	家庭收支(入不敷出=1;略有 节余=3)	3388	2.08	.75

表3汇报了主要变量及其描述性统计结果。结果显示,受访者的社会信任平均赋值是0.54,略倾向于“大部分人是可信的”,对于除亲戚之外的其他人的信任均值是4.33,介于“有点可信”和“相当可信”之间。同时,分项政府质量得分均值,包括民主感知、政府行政评价、法治水平和腐败控制,分别是12.33、22.11、13.69和12.71,标准差分别是1.65、2.68、1.97和1.91,说明不同受访者对政府质量各分项指标的感知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对民主感知的差异最大,政府行政评价差异最小。

在本次调查中,被访问者中男性占53%,城市户口者占31%,汉族占89%,中共党员占15%、社团成员占10%,有宗教信仰者占13%,婚姻状况是已婚或同居者占82%,家庭中有成员下岗的占14%,受教育程度的均值为2.86,介于中学辍学和中学毕业之间,被访问者的平均年龄是45.29岁,家庭收支状况均值是2.08,处于收支相当水平,自评社会地位的平均赋值5.37,居于中间水平,生活幸福度平均赋值2.14,倾向于“比较幸福”。

[1]各维度的测量问项分别为:权威主义:即使父母的要求不合理,子女也应该照着去做;作为学生,不应该质疑老师的权威;和为贵:如果自己与周围的人意见不合,不应该坚持己见;为了集体的和谐,我们应该避免和其他成员发生公开冲突;集体主义:为了集体的利益,个人的利益都可以牺牲;家庭本位:为了家庭的利益,应该把个人的利益摆在其次。

[2]Putnam, R., 1993.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inceton. 福山:《信任:社会道德和繁荣的创造》[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1998年版;Colman, J., 1988,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XCIV, 95-100;詹姆斯·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

[3]张维迎、柯荣柱:《信任及其解释——来自中国的跨省调查分析》[北京]《经济研究》2002年第10期。

[4]李涛、黄纯纯、何兴强、周开国:《什么影响了居民的社会信任水平?——来自广东省的经验数据》[北京]《经济研究》2008年第1期;胡荣:《社会资本与中国农村居民的地域性自主参与——影响村民在村级选举中参与各因素分析》[北京]《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2期。

三、实证结果与分析

利用 SPSS21.0 软件,以“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还是与人交往小心为妙”为解释变量,其中“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赋值为 1,“与人交往小心为妙”赋值为 0,进行二元 logistical 回归分析。结果见表 4。

表 4 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 还是与人交往小心为妙? 的二元 logistic 回归(小心为妙=0;可以信任=1)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	模型四	模型五
民主感知指数	.125(.025)***				.038(.030)
行政效能		.085(.015)***			.022(.020)
法治水平			.118(.020)***		.025(.028)
腐败控制				.150(.020)***	.107(.026)***
儒家传统价值	.005(.029)	.012(.029)	.022(.029)	.020(.029)	.002(.030)
社会支持资源	.042(.042)	.047(.043)	.038(.043)	.047(.043)	.046(.043)
社会舆论压力	.159(.075)*	.166(.075)*	.144(.075)?	.134(.076)†	.144(.076)†
社交网络	.035(.029)	.032(.029)	.037(.029)	.039(.029)	.036(.029)
社团成员	.156(.137)	.132(.137)	.132(.137)	.133(.138)	.121(.138)
户口	.351(.088)***	.326(.088)***	.358(.089)***	.363(.089)***	.373(.089)***
年龄	.010(.003)***	.010(.003)***	.011(.003)***	.011(.003)***	.010(.003)***
教育程度	.093(.022)***	.089(.022)***	.092(.022)***	.090(.022)***	.096(.022)***
政治面貌	.318(.118)**	.316(.118)**	.318(.118)**	.268(.119)*	.270(.119)*
下岗家庭	-.252(.141)†	-.261(.141)†	-.229(.141)	-.228(.142)	-.230(.142)
社会地位	.053(.021)*	.048(.021)*	.047(.021)*	.045(.021)*	.043(.021)*
幸福感	.151(.068)*	.132(.069)†	.135(.068)*	.148(.068)*	.104(.070)
常量	-3.366(.460)***	-3.698(.478)***	-3.530(.461)***	-3.814(.464)***	-4.258(.494)***
Cox-Snell R ²	0.047	0.049	0.05	0.056	0.058
Nagelkerke R ²	0.063	0.066	0.067	0.074	0.078
Omnibus 检验值	158.505***	166.361***	169.101***	188.796***	196.961***
Hosmer-Lemeshow 检验值	13.143n.s.	9.069n.s.	9.185n.s.	5.507n.s.	8.903n.s.
N	3294	3294	3294	3294	3294

注 a. †p<.10.*p<.05.**p<.01.***p<.001

b. 列入模型但没有统计显著性的人口学变量包括:性别、民族、宗教信仰、婚姻状况、社团成员和家庭收支状况

结果显示,民主制度评价、政府行政评价、法治水平和腐败控制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改善政府质量评价的四个维度都能够显著提升社会信任水平。正如有学者所总结的,提高政府质量可以提升社会信任度。理论上可能的渠道包括:首先,腐败控制能够使人产生公正感,从而增加社会信任;第二,民主制度包括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对全国人大的信任以及公开公正的选举可以增强人们的制度信任和程序公正感,从而增加社会信任;第三,法治水平的提升可以相应提高居民的制度信任水平,有利于增强未来的可预期性,从而增强社会信任;第四,政府公共服务绩效的提升、行政公开公平以及对政府政策的回应性和可信性为社会信任提供了示范作用。

在相互控制之后,腐败控制对社会信任的影响仍非常显著。这可能由于腐败控制更能影响公众对制度公平的信任水平,而“能够保障经济公平的制度对低收入国家的居民幸福感和社会信任的影响比政治制度更重要”^[1]。

其他控制变量的统计结果与已有研究的发现是一致的:非农户口受访者比农业户口的受访者表现出更强的信任感,随着年龄的增加越有可能信任其他人,受教育程度越高也越具有社会信任感,党员比非党员受访者表现出更强的信任感,社会地位的提升也有助于增强社会信任感,幸福感的增强对社会信任也具有明显的增强作用,这与幸福经济学所提出的社会信任与居民幸福感间的正向相关关

[1] Bjørnskov C., A. Dreher and J. A. V. Fischer, 2010, “Formal Institution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Revisiting the Cross-country Evidence”,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No.26 pp.419-430.

系一致。即那些“幸福感更高的居民，不仅更热衷频繁的参与政治和公共事务，而且还具有更高的社会信任水平，能够帮助创造更多的社会资本。”^[1]

儒家传统价值对社会信任度的影响并不显著，这与唐文方的研究结果相同，即“儒教并不是中国人际信任的基础”^[2]。从这个角度来说，当把政府质量评价因素纳入考虑之后，社会信任的文化解释受到了挑战。而是否为社团成员对社会信任的影响也没有统计显著性，这可能由于受访者在社团成员问题上缺失值过多有关，这一因素的影响仍有待进一步考证。社会舆论压力与社会信任间表现为统计的正向关系，可以认为社会舆论发挥着和法治类似的效果，强大的社会舆论易形成对个体不可信行为的舆论压力，从而促进人际交往中的可信行为，并进而促进社会信任。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重塑社会信任成为学界和政界关注的热点话题，而已有的研究更多的是从规范层面对二者关系的分析。本文利用了全国大样本数据，系统评估了政府质量如何影响社会信任。研究发现：（1）总体而言，提高政府质量能够显著增加中国居民的社会信任。（2）政府质量的四个维度，即政府行政评价、法治水平、民主制度评价和腐败控制都显著影响着社会信任。在控制其他变量之后，腐败控制对社会信任有着显著的影响。其中，对政府行政效能以及行政公平性的评价和感知会使人们认为政府会按其伦理规则行为，因而是公正和值得信赖的，从而愿意推而广之相信其他人行为的公正性。有学者指出，公民对其他人的信任与透明国际的腐败控制指数之间的相关系数为 0.75^[3]，因为“在信息不完全的现实世界中，居民主要是依据政府官员的行为来断定陌生人是否能够被信任。”^[4]法治水平不仅包括公众对社会法规的信心及遵守情况的感知，对警察和法院的信任，也包括公众对司法机构能力的感知。提高法治水平对于社会信任的意义在于，人们往往倾向于相信廉洁高效的政府可以公正地处理纠纷、公正执法。这种信任感知可以逐渐扩展到人际关系之间，从而构建起社会信任的政治基础。

本研究的意义在于，通过实证研究证明，除了通过“核心价值观”的建构和广泛的公民教育之外，政府自身的行为和政府质量也成为修复社会信任的考量因素^[5]。因此，构建和谐社会和提升社会信任，要求各级政府提升自身的质量。其中，最重要的是创建公正清廉的政府。同时，政治民主化也能显著增加社会信任。另外，政府要更加关注于教育和所有人的“体面劳动”，因为教育提升个人的素质、自信和他信水平，而“体面劳动”提升个人的自评社会地位，也有助于相信他人。

[责任编辑 钱继秋]

[1]Güven, C., 2011, “Are Happier People Better Citizens?” *Kyklos*, Vol.64, pp.178-192.

[2]唐文方：《中国民意与公民社会》〔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05 页。

[3]Rothstein, B., & Stolle, D. (2003). Social capital, impartiality, and the welfare state: An institutional approach (pp. 191-210). In M. Hooghe, & S. Dietlind (Eds.), *Generating social capital: The role of voluntary associations, institutions and government policy*. New York: Palgrave.

[4]陈刚、李树：《政府如何能够让人幸福——政府质量影响居民幸福感的实证研究》〔北京〕《管理世界》2012 年第 8 期。

[5]张康之：《行政伦理的观念与视野》〔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243 页。